

CPI失真扭曲经济行为亟待调整

□易宏容

对国内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社会上一直存在着质疑之声,已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但无论社会如何质疑,相关职能部门都会用种种理由来推诿。比如说,有人质疑国内CPI为什么没有反映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职能部门就说,这是国际惯例,房价就是不能算入CPI中。又比如,央行调查表明目前公布的CPI与居民的实际感受相差太远,职能部门又会说,个人感觉不能作为统计数据的依据,因为这种感觉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如果政府的职能部门真的是按照国际惯例,真的追求CPI的科学性,那么CPI所表示的含义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实生活中的消费价格在快速上涨,居民手中所持有的货币越来越不值钱,但统计上的CPI却变动十分微小,职能部门公布的数据与居民生活感觉相悖。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CPI是如何确立和表示的。美国国家统计局工作人员在每个月的前三周要抽查相关企业,并对大约23000个零售商和87个城市中的其他商业机构进行电话采访,



以此收集8万种商品和服务价格,并对相同组成的商品和服务进行月度分析,以获得对消费品价格变化的基本信息。为了减少统计中的噪声,美国还另外发布了两个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即扣除食品和能源等不稳定因素后的CPI。也就是说,CPI的测量是随着时间变化的。CPI包括200多种不同商品与服务零售价格平均值,这些商品与服务分为8个主要类别。在计算CPI时,每一个类别都有一个能够显示其重要性的权重。这些权重是通过调查成千上万个家庭和个人前两年购买消费品的比重来确定的。这些权重每两年要修正一次,以便保持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权重与居民变化了的消费偏好相一致。

比如说,2006年1月美国的CPI权重是这样构成的:居住类(包括住宅建筑、燃料和公用

设施、家具与房屋维修)权重为42.1%、食品与饮料为15.4%、交通运输16.9%、医疗6.1%、服装4.0%、娱乐5.8%、教育与交流5.9%、其他商品和服务3.8%等。从中可以看到,在美国居民居住类消费权重最大,超过了四成;其次才是交通运输、食品和饮料。这三者所占比重达到了74%以上。

在这里可以看到,美国的CPI指数从数据收集、数据制作、数据发表及数据修改等每一个环节都是透明公开的。以数据的透明公开性为保证其数据科学、规范及权威性。比如说,CPI权重的确定,不仅能够根据市场透明公开性来保证其数据科学的规范性,而且也能反映居民消费生活的变化性。美国CPI权重每两年就有一次大的修订,以此来真实反映居民消费模式的变化。但是,在中国,一是CPI没有连续的历史数据,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数据差异大;二是CPI权重为什么不公开与透明?最大的问题可能就在于

信息收集与制作过程不公开和不透明,而且CPI权重完全也不公开和透明。研究者要想知道CPI权重,只能靠自己来计算与测定。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我国CPI的确定与测算不公开、不透明,当这种CPI与居民实际消费相脱节时,相关职能部门还会以莫须有理由来蒙蔽民众。反观美国,CPI指数的确立不仅是来自于千万居民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而且随时间的变化会不断调整CPI。在美国,CPI能不断反映居民消费生活的连续性,而且也能反映居民消费生活的变化性。美国CPI权重每两年就有一次大的修订,以此来真实反映居民消费模式的变化。但是,在中国,一是CPI没有连续的历史数据,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数据差异大;二是CPI权重为什么不公开与透明?最大的问题可能就在于

CPI编制的人为性及权重设计的不科学性。比如,中国的CPI权重是根据1993年时的情况确定的,那时中国刚从计划经济走出,无论是居民消费品的丰富性还是居民的消费生活水平,都与现在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比如说居住类,那时是计划体制下的福利分房,但经过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国内的住房消费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还以1993年情况来衡量现在的居民住房消费,这些CPI数据肯定会误导社会和误导政府决策。还有,食品消费权重也是如此。尽管目前职能部门说要调整CPI权重,但社会根本就不知道调整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由于美国CPI的公开透明、与时俱进,它不仅能够反映居民实际生活的消费模式变化,也成为企业、经济分析员及研究者重要的参考依据。可以说,CPI的任

何变化都反映在市场变化的预期中。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及个人经济行为,也有利于政府决策。但是,由于国内CPI在统计方法上的不透明,从而使企业及个人对政府公布的CPI数据关注不够,而政府通过这样的数据进行决策,就容易造成对经济形势判断不足,甚至会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比如,低利率政策是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许多经济行为扭曲的根源。但由于CPI过低,或国内CPI一直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上,利率过低必然让债权利益受损和债务人受益。国内低利率政策也成了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重要根源之一。

总之,中国CPI确定的国际惯性与非国际惯性(即仅根据自己需要有选择的国际惯例化)并存的局面,使CPI的确定不透明、不科学和不规范,以这样的数据来影响政府决策,必然会扭曲一系列经济行为。在此,我建议政府职能部门在CPI确立上,要么全部国际惯例化,要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一套能反映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CPI指数,以便为我们企业、居民及政府提供好的经济信息与数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

房价或在今年出现转折

□贾必

虽经两次宏观调控,房价上涨的步伐仍然未被有效阻止。然而,这种状况可能在2007年发生改变。

首先,国家调控楼市的决心更坚定,且开始动用更为严厉和具体的措施。1月9日,建设部公布的《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将小户型面积标准放宽,但不到24小时即紧急宣布废止。随后,有媒体披露,此意见稿是因遭国务院的反对而匆匆宣布废止的。许多人从中清晰地感受到了国务院对事关调控大局的刚性规定的坚守,立场是何等的坚定。

导致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开发商囤积房产,如今,国家也开始出台重拳。从1月1日起,大城市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税额,已由0.5元至10元调整为1.5元至30元;从2月1日起,国家税务总局要求正式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清算30%-60%不等的土地增值税。一旦这些政策得到认真执行,且确保相关税收不被开发商转嫁出去,对开发商的囤积居奇做法无疑是釜底抽薪之举。因而,从政策面来看,房价在2007年出现拐点的可能性很大。

其次,股市的繁荣或影响开发商的资金链,进而影响房价的变动。在股市低迷的五年中,恰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最为活跃、涨幅最快的五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居民的投资渠道少,当股市低迷,大量资金涌入房市推动了房价的上涨。虽然房市与股市并不一定存在

此消彼长的关系,然而,当房市经历连续五年的快速上涨,收益空间已经大为缩小,且面临宏观调控的巨大风险,而股市的繁荣能够带来更多、更快捷的收益时,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的状况,就可能以一种明显而直观的形态表现出来。

央行最近发布的金融运行数据显示,2006年全年,居民户存款增加2.09万亿元,同比少增1125亿元。原因是,股市上涨较快,成交量较大,分流了一部分居民储蓄存款。应该认识到,用于储蓄的资金,并非投机意愿非常强烈的那部分资金,而最近几年活跃于房地产市场、每每兴风作浪的众多游资,则是投机性强、嗅觉最为灵敏的资金。当部分储蓄也开始转向股市时,这部分投机特征更为明显的资金去向就不难想象。

事实上,面对股市的火爆所带来的可观回报,一些人甚至将房产典当去炒股。对房地产商而言,“押房”炒股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众所周知,我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以上海为例,房产开发企业自有资金2001年为18.84%,2002年为17.53%,2003年为16.94%。

由于自有资金少,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链非常脆弱,尽管两次房市调控尚未产生明显效果,但几乎每次调控之初,只要银行略微紧缩一下贷款,马上就有开发商靠高利贷艰难度日。当股市繁荣,大量以投资、投机为目的的资金分流出去,对于房地产开发商而言,将是一场真正严峻的考验,而房价也随时可能会出现转折。

高效率免税制度有利慈善业

□云力

1月17日,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规划统计公报公布,受各界关注的慈善法草案已经起草完毕。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缓慢,与免税制度的缺陷不无关系。其一,免税额过低。根据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的30%的部分,可以扣除。对于企业而言,3%的免税额太小,等于企业捐赠越多,纳税越多,抑制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而美国对于企业捐赠的免税比例是11%,而且,其免税比例还在不断提高。

其二,免税程序太烦琐。效率太低,公众为之付出的时间成本太高。民政部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曾亲自体验了一次申请退税的过程。他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了500元钱,随后申请退税的手续竟多达10道,整整办了两个月,民政部救济司司

长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免税程序的烦琐和低成本,使得免税措施无法真正落到实处。

而同样的慈善捐赠,在美国经过简单的申报就可完成免税程序。尽管如此,在新一轮税改中,美国依然强调,要为慈善捐助提供更为便利的税收政策,简化捐助扣除程序并降低适用标准。

合理的免税政策能对慈善事业起到引导和激励作用,其意义甚远远超过了免税本身。正是在优惠、高效率的免税政策下,美国的慈善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2003年,美国人均慈善捐款为460美元,超过了2005年,美国的人均慈善捐款就达到了878美元。相比之下,我国人均捐款一度仅为0.92元,99%的企业没有参与过捐赠。

慈善事业可以唤起国人的爱心,凝聚起强大的力量,救助灾民、弱者和一切面临不幸的人,能对社会和诣起到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政府应从制度设计方面,最大限度地创造条件,鼓励慈善活动。

行政浪费是影响民生投入的一大根源

□陈遂

“我们的财政支出政策问题其实相当严重!”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在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举行的一次讲座中指出,2006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什么支出最多?公车出行支出3000多亿元,吃饭3700多亿元。”

张曙光称公车出行支出和吃饭支出的6700亿元“是一个可怕的数据”。事实也正是如此,6700亿元占2006年全年财政总收入(37636亿元)的17.8%,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被浪费掉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王岭在提案中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而且,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

行政事业支出浪费严重,必然压缩对民生的资金投入。比如医疗,政府财政性投入在所有医疗费用中所占的比例,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在40%以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达到了27%,而我国只有17%。由于政府医疗投入资金不足,医疗行业的公益性特征被抹杀,而功利性特点得到强化,这正是医患矛盾尖锐的根源。

再比如教育,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1%,而我国曾经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至今未能实现。全国政协委员殷海光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3951.59亿元,占GDP的比例是2.16%,这与张曙光先生披露的2006年的吃饭支出相差无几。

2005年,国家财政只拿出了300亿元,就减免了农村中小学生的学费,使全国1.5亿的学生受益,而做到这一点,只需公车出行开节省10%,吃饭支出节省8.1%即可做到。倘若行政事业开支能够大幅度削减(比如一半),那么,无疑能够解决更多的民生问题。反之,行政



刘道伟 制图

事业支出的浪费,则会进一步挤压对民生的投入。

行政事业支出严重浪费的根源,在于从预算的编制到执行,基本由政府部门主导,它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也是在所难免,相应的,公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完整体现,加之现在公众无法介入监督,使得各级政府部门无所顾忌,尽可能多地利用财政资金牟取部门利益。去年9月,审计署公布了42个部门单位2005年度预算执行审计报告,披露了审计出的一系列问题,但由于审计缺少严厉的问责制度相配合,相关违规乃至违法行为仍在不断重复上演。

政府浪费是影响民生投入的一大因素。鉴于这种浪费现象的严重性,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使预算编制能够反映民意,并接受民众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事业支出的浪费现象才能得到遏制,民生投入才更有保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深化,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升级,在未来的时间里,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重组将以更大规模展示出来,中国企业理应在这种市场并购中争当主角。这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还是以宝钢集团收购八一钢铁来说,通过这次成功的并购,宝钢就有条件利用八一钢铁具备的丰富的铁矿石和煤炭资源,其独特的区位优势甚至高于宝钢产品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市场上的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宝钢在国际市场上一直受到困扰的铁矿石定价话语权得提升。并购的成功使这家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在西部“棋盘”上落下了有力的一子,这家中国本土钢铁业龙头的体系再一次得到了加强。

但是,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是在提倡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把国内企业放手交给外资企业通吃。前几年,一些地方在企业并购中,以吸引到外资企业入主为荣,为了把“高鼻子”吸引过来,不惜自降身价,压低并购价格,同时又对国内有意进行并购的企业设置高门槛,甚至利用行政手段将其拒之门外,这其实也是一种“扭曲政绩观”的反映。这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并购行为,虽然打着市场的旗号,但其实离市场很远,是一种不正常的经济行为,今天理应收到遏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深化,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升级,在未来的时间里,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重组将以更大规模展示出来,中国企业理应在这种市场并购中争当主角。这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还是以宝钢集团收购八一钢铁来说,通过这次成功的并购,宝钢就有条件利用八一钢铁具备的丰富的铁矿石和煤炭资源,其独特的区位优势甚至高于宝钢产品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市场上的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宝钢在国际市场上一直受到困扰的铁矿石定价话语权得提升。并购的成功使这家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在西部“棋盘”上落下了有力的一子,这家中国本土钢铁业龙头的体系再一次得到了加强。

中国企业在企业并购中争当主角,这就需要企业提高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一个成熟的市场对所有企业都是公平的,并不因为我们国内企业,在并购同样是国内的企业时就能得到特殊的照顾,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照样会缺乏话语权,照样会被市场淘汰。因此,中国企业必须苦练“内功”,加快把企业做大做强,切实提高自身的经营实力,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条件在并购中脱颖而出。

在宝钢八钢签约仪式上,宝钢集团董事长谢安华说:“中国的钢铁市场潜力巨大,受到国际企业的高度关注,国际大型钢铁企业已加快了对中国钢铁企业的渗透。此时此刻,中国钢铁企业应该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谢安华作为行业中人,说的是钢铁行业的事,但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黄金十年”大讨论(14)

保险业:在求新求变中发展壮大

□陈丽棠

未来的十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各种深层次的问题也将日益暴露,而且不能不再像以往那样随意搁置。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适时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力争减轻改革过程中可能付出的各种代价。在这厚方面,加快发展保险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费收入已从4.6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500多亿元人民币,年平均增长约35%,远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9.7%的增长速度。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保险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加快了中资保险公司体制改革,推进了保险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保险业已实现了一个独家经营到多元化主体竞争的转变,形成了一个多家竞

争、产寿并举、全面开放的市场格局,初步完成了产业资本、市场、规则、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积累。

我国保险业虽然面临着广阔的发展机遇,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规则不完善、竞争秩序不规范、管理体制不健全、保险信息不对称、有效供给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单一、寿险业面临较严重的利差损以及粗放型经营管理、人才缺乏等新兴市场共有的特点。特别是我国保险业关键指标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内保险密度与深度不高。2003年我国保险密度为300.3元人民币,保险深度为3.33%。而同期世界平均保险密度为469.6美元(约合3887元人民币),平均保险深度为8.06%。日本人均6张寿险保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保险市场与社会的真正需要比起来,还有许许多多文章可做。

我国保险市场还是一个新兴市场,因此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直接学习世界保险先进经验,少走弯路。我国保

险业要想“做大做强”并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惟有大力创新。保险业的现存问题与矛盾,很多都是在传统体制和思维模式下产生的,由此创新成为必要手段。创新不仅可以解决保险业在传统体制和思维模式下产生的诸多问题和矛盾,更可以促进我国保险业适应国际竞争和金融混业经营的新形势。

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临逐步饱和的市场,国际保险业开始不断地在保险产品、市场营销、管理技术、组织制度、经营模式等方面进行全面创新。到80年代已形成全球趋势和浪潮。全球范围内千姿百态、层出不穷的保险创新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保险创新所在国的金融深化和金融保险制度的整体变革,而且也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续不竭的动力。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保险产品,基本上是投保人需求,公司就能开发出所需要的产品。针对人类所面临风险的变化和涌现的新投保需求,这一时期国际保险业还开发出一些承保对象、责任范围等前所

未有的险种,来刺激和满足人们多元化、个性化的保险需求。但我国保险业在产品创新方面显得不足,现有的险种,传统的多,现代的少,大众化的多,个性化的少。以家财险为例,目前各公司的产品基本与20世纪80年代的条款费率相差无几。人民生活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老的条款费率显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此外,新产品开发周期过长也影响了产品创新进度。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推动了公众的富裕程度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客户需求变得日益多样化,传统的同质化的大众市场逐步为需求迥异的细分市场所代替。未来十年,中国寿险市场竞争将进入客户至上市场导向时代,如何区别细分市场,扬长避短,以满足不同类别、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是保险机构在激烈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趋势,迫切要求保险机构在产生竞争优势和市场区分的功能上多下工夫,别出心裁,满足客户需求。